

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与中国空间经济政策调整

张可云, 庄宗武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深层次要求,能否抓住数字经济这个战略机遇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已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目前,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呈现以下典型特征事实: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地区主导产业更新、深化各地区产业分工、提升各地区经济韧性和增强各地区经济结构包容性;另一方面,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会增加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的难度。为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推进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应有针对地围绕数据要素区域互通、数字经济区域协作与数字红利区域共享等方面调整空间经济政策。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经济结构转型;区域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差距;空间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4-0025-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4.004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in China

Zhang Keyun, Zhuang Zongwu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put forward deeper demands on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hether the strategical opportunity brought by digital economy can be seized to achieve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ly concerned hot issue in academics and government circles. Digital economy drives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through quality reforming, efficiency reforming and power reforming. At present, digital economy presents the following typical factual characteristics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it promotes leading industries' renewal, deepens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elevate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enhances economy structures' inclusiven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gital economy gap among regions will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 In pursuit of narrowing digital economy gap among regions, 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achiev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收稿日期:2023-03-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3071);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22XNH201);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拔尖创新人才项目(2023YJBJCX10)

作者简介:张可云(1964—),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政策研究。

通信作者:庄宗武(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development, China's spatial economic policies should be adjusted in a targeted manner focusing on data elements' regional interoperability, digital economy's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digital dividends' regional sharing.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gap; spatial economic policy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而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世界范围看,经济结构转型也是世界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目前,中国正以愈发稳健的步伐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但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仍面临国内外多重挑战。国际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国际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出,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面临更加动荡的国际环境。比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采取了严苛的贸易限制和不正当打压,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贸易进行限制^[1],中国通过整合全球资源优化国内产业、实现自身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着更多的阻力和障碍^[2]。在国内,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其增长动力、发展方式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越,全面提升了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但其赖以维系的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的红利和动力正在衰减^[3]。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很难突破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中面临的现实障碍,中国急需更强劲的技术动力赋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密切相关。区域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新动能。纵观世界发展史,每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强劲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启的信息技术革命,

奠定了经济发展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极大推动了中国各地区的产业分工和产业现代化,但推动经济发展的潜能已临近衰竭^[4],已不足以支撑中国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深层次重构。与此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作为新通用技术的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新动能,它正驱动各地区诸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催化剂、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国家层面对数字中国战略统一布局,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济战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50.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1.5%。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并对中国数字经济建设进行了全方位布局和系统性谋划,这标志着数字经济全面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将成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政策取向。也就是说,中国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的战略机遇,持续强化数字技术与各地区各类产业的深度融合,从而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

当下,数字经济正蓬勃发展,但学界鲜有关于其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的研究。事实上,研究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中国利用数字技术去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推动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还能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提前谋划、引导经济结构转型,从而为掌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提供学理支撑。据此,引出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数字经济如何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

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呈现哪些特征事实?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我国应如何调整空间经济政策?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视角搭建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逻辑,厘清了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机理;其二,呈现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事实,丰富了数字经济与现代经济结构相关的研究;其三,为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提出空间经济政策调整,能够为地方政府完善数字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般而言,经济组织会随着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调整自身行为,最终引发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国土辽阔,不同区间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具有明显异质性,故本文主要以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通过加快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质量变革

质量变革包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质量变革的目的是建立适配的质量供给体系,生产产品的竞争力要与大国地位相匹配,提供服务的质量要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称。产品竞争力不够强和服务质量不够高始终是限制我国建设经济强国的突出短板^[5]。虽然东部地区能够生产质量较高的产品,但其经济服务在针对性和辐射范围方面等仍存在不足,这限制了东部地区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转型。产品质量不高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质量变革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传统产业,这使其很难生产出符合现代经济需求的高质量产品。而中部、西部地区的产品质

量不高与技术和设备水平相对落后有关,这些地区主要依赖传统工艺和设备组织生产,难以精细控制产品质量,制约了这些地区的产品质量变革。在传统经济结构中,一些地区产品与服务质量不高,供需难以平衡,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矛盾凸显,这些都阻碍了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数字技术的发展能为我国各地区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支撑。东部地区具有较成熟的产业分工体系,随着全方位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东部地区各类传统服务部门将不断裂变、更新,并加速形成专门负责中间服务的数字部门。这类数字部门可以依托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开展专业的数字服务,利用数字技术深入挖掘大数据中隐含的各类偏好差异,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个性化与精细化的服务。此外,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联结,东部地区优质的服务模式可以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共享,从而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引领服务质量变革和提升。数字经济也为东北地区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机遇。数字技术和大数据的使用能够帮助东北地区企业更好识别市场需求,挖掘市场潜力,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企业根据市场信息不断改进工艺、更新产品,维持竞争优势,及时生产出与现代经济体系相称的产品,建立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产品竞争力,有效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供需不平衡难题。同时,数字经济能够加快推进中部、西部地区传统产业更新,通过传统产业数字化的方式帮助企业实现全面的质量控制和工艺改进^[6],从而稳步提升当地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

(二)效率变革

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投入产出效率高低的竞争。效率变革的目的是不断发现并填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者忽视的各类低效率洼地,奠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基础^[7]。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各地区的低效率

问题逐渐凸显^[8-9]。东部地区虽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生产效率增幅波动过大,缺少高质量的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东北地区不仅产业结构较为传统、单一,而且缺少新产业和新业态,使得东北地区在提升生产效率过程中常常面临瓶颈。而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效率不够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优质资源投入不足,中部、西部地区吸引优质资源的能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导致其与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差距明显。各地区的低效率洼地问题常常使其难以突破发展瓶颈,进而限制了区域经济结构转型。

数字技术,一方面,通过融入实体经济的生产实践提升其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特殊性可以催生要素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数字经济的效率变革机制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效率变革机制主要是将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不断渗透至各类产业,以更加稳定的数字化系统支撑经济结构更新。数字经济的全方位渗透能够避免各产业的生产效率出现剧烈波动,从而为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稳定的效率增长源泉。对东北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效率变革机制主要是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有针对性地识别传统工业中的短板,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打破传统生产方式中的各种束缚,不断引领产业链向更高效率环节转型升级。对中部、西部地区来说,数字经济主要发挥的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利用数据要素催生出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缓解这些地区优质资源投入不足的困境,进而提升这些地区的生产效率。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桥梁的搭建正在持续模糊地理边界,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传统要素配置机制已经发生明显改变,提升经济生产率的关键人才、技术等要素得以跨空间交换^[10]。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的发展,也有助于中部、西部地区共享东部地区的优质资源,能够弥补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效率提升过程中的资源短板,进而促进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持续

提升。

(三)动力变革

动力变革就是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效力递减的情况下,为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加快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尽相同。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同生产要素共同驱动的结果。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要素,借助劳动力的数量和成本优势从事产品的组装、加工和生产等劳动密集型活动,从而获取劳动力数量红利;而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则依靠投入大量的资本与生产技术,从而获取资本红利。然而,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效力递减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渐减少,已不足以支撑中国各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11]。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要素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不仅拓展了生产要素的范畴、催生了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而且还优化了各地区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增列为一种生产要素。当前,数据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等环节,现已成为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关键生产要素。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具有庞大的互联网使用群体,在长期发展中积攒了海量数据资源。一方面,数据要素作为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可以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数据要素不仅具有复制成本接近零的优点,而且作为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优点,这些优点可以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新的动力。数据要素在企业生产、管理、销售等领域的全面应用,不仅能够持续革新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还会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有助于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使用会优化传统经济社会中的要素结构,推动各类要素产生交互,有助于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转型。随着数据要素不断融入生产、分配等环节,数据要素必然会与其他要素产生交互,

数据要素中内嵌的信息与其他要素的交互可以实现要素重组和优化要素结构,从而帮助各地区挖掘潜在的新兴产业和增长领域,进而实现全要素的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倍增效应。综上,数字经济不仅拓展了经济结构转型中的生产要素范畴,而且优化了各地区要素结构,能够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现代化和可持续的动力。

三、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特征事实

(一)数字经济推动各地区主导产业更新

一般来说,主导产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据较大比重,能够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对其他产业发展起到明显的拉动或引导作用。因此,主导产业能否跟上时代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结构转型能否顺利与成功。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的更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为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数字经济能够帮助发达地区实现主导产业更新。发达地区的金融行业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变革,实现金融服务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提高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进而形成现代化的数字金融体系。数字经济还能够推动发达地区主导产业与其他现代化产业的跨界融合,从而为这些地区主导产业的更新提供更多的现代化方案。发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为主导产业注入本地的文化资源,实现主导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融合,从而实现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的更新。

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主导产业的更新尤为重要,因为制约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瓶颈是主导产业无法及时更新。而数字经济能够推进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的更新。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可以帮助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实现产品生产和销售等全过程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弥补传统生产方式的不足、提升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数字经济同样有助于老工业基地主导产业的顺利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变革,老工业基地可以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去改进和升级该地区的传统主导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主导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进而改善本地传统主导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数字经济还能够为老工业基地主导产业的更新带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更多现代化方案,有助于帮助主导产业实现更高效发展,从而帮助其尽快走出停滞不前的困境。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能够引导老工业基地产业生态的更新,加快形成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生态圈。具体来说,数字经济能够促进老工业基地不断催生与主导产业配套的数字技术、信息平台等相关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生态圈的形成,不断吸引创新要素流入该地区,持续增强该地区主导产业的活力。

(二)数字经济深化各地区产业分工

产业分工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能否成功转型,往往取决于它的产业分工是否完善。较为完善的地区产业分工有助于该地区发挥产业间协同作用,塑造健全的产业体系,进而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数字经济延长了各地区产业链条,深化了各地区产业分工。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持续推进,大量与数字技术有关的企业联结成链、衔接成群,致使产业链的横向延伸和纵向裂变不断深化。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数字技术现已成为数字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链正在形成。数字经济还催生了许多以数字服务为核心的产业链,例如电子商务、在线旅游、在线教育等,这些产业链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端等渠道向用户提供各种数字服务。产业链条的细分可以进一步深化地区产业分工,不断丰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涵,这也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宝贵机遇。

同样,数字经济还提升了各地区产业间的协同发展水平,从而夯实了各地区产业分工基

础。数字经济使信息获取和传递更加快速、便捷,产业内生产、销售等环节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发挥各环节之间的协同作用。各地区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搭建数字桥梁,使不同产业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高效便捷,信息、技术的传播不再受制于传统的空间和时间限制,从而深化不同产业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数字经济还促进了各产业之间的融合。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同产业之间边界逐渐模糊,协作程度日趋紧密。另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的推动,不同产业之间融合变得更加容易和快捷,这些产业可以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结和协作强化本地产业分工,为本地经济结构转型打造优越的产业分工条件。

(三)数字经济提升各地区经济韧性

近年来,大国竞争、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给我国经济结构带来了极大冲击,也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潜在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因此,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前提下,增强经济韧性、稳定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也就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重视的课题。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激发数据要素的优势,并逐渐用数据要素代替其他限制使用的要素,促进各地区产业多样化,减少对某一要素或某一产业的过度依赖,使地区经济结构具有更强的韧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现代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新要素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而新要素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可以优化传统经济结构,增强地区经济系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由于数字经济催生了较为丰富的要素投入和产业形式,即使各地区面临突发事件或产业链供应链某环节暴露出短板等风险,都可以通过调整产业链其他环节或者供应链去应对面临的风险。并且,各地区在经历风险后,整个经济系统的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会增强,从而提高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扩大经济结构转型的回旋空间。

数字经济除了通过要素和产业本身提高地区经济韧性外,还提高了各地区对重大冲击的

预警能力,能够帮助各地区提前有效规避重大经济风险。各地区通过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可以对各种情景进行预测和模拟,从而提供更准确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帮助各地区做好风险应对预案。各地区还可以综合利用智能交通、医疗卫生、能源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系统应对突发危机,降低该突发危机对经济结构的冲击。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推进,我国数字技术在地区经济中基本得到全方位应用,区域经济结构的韧性也明显增强。

(四)数字经济增强各地区经济结构包容性

传统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更强调规模经济和产业分工,忽略了经济主体在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及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地区正在高速发展,而另外一些地区可能还困于“穷”“堵”“老”等区域病^[12];一些产业在快速壮大,而另外一些产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发展较慢。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区域经济结构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往往会导致地区经济活力不足以及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灵活化^[8]。在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的变革可以帮助当地企业加速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其提供重要机遇,特别是在传统产业上,数字经济可以为欠发达地区企业提供更高效、更精准的供应及物流服务,将传统特色产品传递到更广阔的市场。此外,数字经济还可以为老工业基地带来新的发展方向,重构发展路径,摆脱长期的发展低迷状态。各地区均可将数字技术注入与自身竞争优势相关的环节,塑造既有国际前沿技术又有普通技能的包容性经济结构体系,充分发挥包容性经济结构中丰富要素、多元性市场需求与产业体系所形成的叠加效应。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各地区根据自身优势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着力推进各地区产业融合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包容性。

(五)数字经济差距增加各地区经济结构协同转型难度

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正蓬勃发展,但在这个超大经济体内部,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并非均质,且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我国不同地区间已呈现明显的数字经济差距。虽然数字经济有助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但过大的数字经济差距会阻碍地区间经济结构的协同转型。当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时,地区间数字经济能够产生明显的互补效应,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机制协同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不同地区在发展数字经济专长和特色等方面存在差异,合理的数字经济差距可以激励各地区在数字产业链上既分工又合作,从而进一步夯实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数字经济基础。例如,一些地区在数字技术研究和开发等方面具备优势,而其他地区则可能在数字成本和数据资源等方面更具潜力,如果我国能够将各地区数字经济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数字经济联动机制,进而推动各区域经济结构的协同转型。

如果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过大,就削弱了地区间数字经济的互补效应,增加了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的难度。这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往往很难有效对接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链,并且后者的数字技术等关键信息推广应用到前者时需要较高的吸收门槛。实际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正在扩大,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地区的经济结构虽然也在逐步转型,但其转型的速度远低于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由此可见,为加快推动区域经济结构的协同转型,充分发挥地区间数字经济的互补效应,我国必须通过调整空间经济政策以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的差距。

四、以空间经济政策调整促进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缩小、推动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

新一轮数字技术在推动世界经济格局调

整、加速经济结构演化的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区域差距^[13]。为抓住数字经济提供的战略机遇,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推进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应有针对性地调整空间经济政策。

(一)数据要素区域互通政策

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资源和信息要素有较大差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已充分利用数据要素去改善传统要素的投入结构,但不少欠发达地区仍然面临着数据要素使用不足的情况,这与欠发达地区不充分的数据要素基础有关。为更好弥补欠发达地区数据要素短板,实现数据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共享,需要尽快完善数据要素区域共享政策。一方面,需要不断破除阻碍数据要素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引导发达地区数据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扩散。各地方政府要协力制定数据流通的标准和规范,减少数据流通的成本和障碍,为数据要素在不同地区间共享提供支持。努力推动要素在各地区实现共享、交换、重组,进而帮助各地区利用差异化的数据要素补齐本地经济结构短板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要强化大型互联网企业在数据要素共享方面的作用。大型互联网企业是数据生产和应用的重要载体,对推动各地区数据要素共享和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作用。大型互联网企业可以在数据要素区域互通政策引导下,制定行业数据共享标准和规范,为各地区间数据共享和交流提供政策支持。此外,应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主动深挖、共享各地区数据要素,加强其与不同地区企业间的数据要素交流与合作,提高不同地区间数据要素的传递和利用效率。

(二)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政策

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是实现数字经济共赢、协同推进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所在。而数字经济区域协作需要精准识别各地区数字经济的特色和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政策,明确数字经济区域协作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厘清各地区在数字经济区域协作中的角色和职责,发挥各地区数字

经济的协同和互补作用,以便协同推进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良好的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政策离不开各地区数字政策的协调和沟通。我们需要共同做好各地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才能为区域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更加有力的数字政策支持。制定数字经济区域协作政策时,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要考虑各地区数字经济布局的互补性以及数字经济与本地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适配性,要塑造功能互补、相互借鉴的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布局,从而避免各地区数字产业的重复建设和同构化;其二,要发挥各地合力去做优做强数字经济,打造包含各地区在内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提升数字经济总体规模;其三,要强化各地区间数字经济合作,加强各地区数字经济产业链的衔接,在数字经济合作中实现数字共荣;其四,为推动数字经济协作取得更大成效,还需要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发展腹地,发挥各地区数字经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应,构建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型数字产业生态圈,为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争取更大的新型产业生态支撑。

(三)数字红利区域共享政策

各类主体公平享受数字红利,可以为各地区持续推进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经济保障。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依然不够普惠,少数欠发达地区获取数字红利的能力较弱,这极大削弱了这些地区经济结构转型的持续性。技术是中性的,能否让各类主体共享数字技术红利,关键在于数字技术如何应用。这就需要通过数字红利区域共享政策,发展亲贫、益贫、普惠的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各地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惠及全体人民的现代公共服务,实现数字经济的普惠化和普及化。特别是要注重数字技术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应用,切实提高数字红利的普惠程度。在教育方面,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提供更加全面、有效、智能的教育服务,更好地分配和利用教育资源。在就业方面,可

以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人们的技能和竞争力,让更多欠发达地区经济主体有机会参与自身数字经济建设和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在医疗方面,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让更多的人在数字医疗服务中受益。在社会保障方面,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和覆盖面,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保障的福利。此外,还应加强数字经济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通过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拓宽获取数字服务的渠道,帮助欠发达地区更好地获取数字红利,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转型。

[参考文献]

- [1] 付蕾. 国际制裁对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85-97.
- [2] 戚聿东, 褚席. 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 财经研究, 2021(7): 18-32, 168.
- [3]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 经济研究, 2013(9): 17-29.
- [4] 戴翔, 李亚. 数字技术、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开放战略调整[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2(5): 31-40.
- [5] 施炳展.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 测度与事实[J]. 经济学(季刊), 2014(1): 263-284.
- [6] 张再杰. 推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加快发展[N]. 光明日报, 2023-03-20.
- [7] 刘世锦.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J]. 中国发展观察, 2017(21): 5-6, 9.
- [8]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 经济研究, 2014(12): 4-17, 32.
- [9] 戴翔, 沈佳倩, 占丽. 扩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36-48.
- [10] 张可云, 杨丹辉, 赵红军, 等. 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J]. 区域经济评论, 2022(3): 8-19.
- [11] 刘伟, 陈彦斌. 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0(4): 54-68.
- [12] 张可云. 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J]. 区域经济评论, 2015(2): 5-9, 2.
- [13] 韩峰, 黄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4): 98-110.